

《洪亮吉：清朝士大夫的生存之道》
 [日]片冈一忠著 张璋译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25年7月

一位非典型乾嘉士大夫的心境与生涯

□赵刘洋

历史学家的乐趣之一或许就是将那些湮没在历史长河中的重要事迹和思想打捞出来。被梁启超和陈寅恪等史学名家所欣赏的张荫麟，于1926年在著名的《东方杂志》上发表了一篇讨论洪亮吉人口思想的文章，正是因为这篇文章，人们才知道原来在马尔萨斯(Thomas Malthus)之前，清代乾嘉时期就有一位士大夫在人口方面提出过重要思想。洪亮吉甚至还被之后的学者冠以并不很恰当的“中国的马尔萨斯”之称。

洪亮吉的确是一位值得被认真对待的清代士大夫。他生于乾隆十一年(1746年)，卒于嘉庆十四年(1809年)，一生跌宕起伏。出身底层，勤奋好学，四十五岁时以一甲第二名考中进士，既经历了科举之路的艰辛，也见识到官场生涯的险恶，还因直言上书嘉庆而被贬，被赦免后回到家乡积极著书立说和参与地方公益，为士大夫树立了典范。洪亮吉留下三十余种著作，近五千首诗歌以及大量文章，与那些不关心世事的学者不同，《清史稿》中称洪亮吉“喜论当世事”，他的思想和生涯亦折射出古老的中国由盛而衰的转折。

而日本学者片冈一忠教授关于洪亮吉的传记，通过解读洪亮吉人生重要节点的诗文，追溯其情感和意识的变化，希望为我们揭示一位非典型乾嘉士大夫的复杂的人生经历和心境。

洪亮吉出生于常州府兴隆里一处租屋中，他的父亲洪翊多次参加乡试，均未考中，只能通过帮友这种不稳定的工作以换取一些微薄收入从而维持生计。洪翊在洪亮吉六岁时则骤然离世，外祖母龚氏看不过洪亮吉母子生活困难，因而收留了他们。

洪亮吉留下不少关于自己早年生活的诗文，透过这些诗文，我们能够看到，即使在盛世的江南地区，老百姓的生活依然面临诸多困境。比如《岁歉篇》中就写道：

十三知岁歉，十四忍朝饥。母病通师俸，儿长著父衣。瘦伶亲串识，贫觉馆僮讥。冷巷归来晚，声声出破扉。

此诗大意是，十三岁时曾遭遇岁歉，十四岁时不得不忍受早上醒来饥肠辘辘的感觉，因为母亲生病，连学费也交不起，家里实在太穷了，个子长高了也只能穿着父亲遗留下来的衣物，那时候穷到吃不上饭，既感受到亲戚们的慈爱和帮助，也遭受私塾里小仆人的恶语相向。夜晚归来路过寒冷巷子的人们，依然能够听到自己琅琅的读书声。

类似诗文很多，比如因为岁歉，洪亮吉的家人不得不打发走从父亲生前就一直侍奉他们的仆人。

当时中国最富裕的地区江南尚且如此，遑论其他地方，不禁令人感叹民生之多艰。洪亮吉的境遇很难说是个案，片冈一忠查阅光绪年间所修《武进阳湖县志》发现，洪亮吉在常州的时候，江南地区自然灾害频繁，比如：乾隆十四年，大疫；十五年，大水；十六年，旱；十七年，大旱；二十年，大旱；二十一年，春夏大疫；二十四年，干旱与虫灾引发饥荒。

出身贫寒的洪亮吉对穷苦人的方

方面都至为敏感，而且他游历甚广，编撰了许多方志，对全国的社会经济情况相当明了。这种经历既深刻影响了洪亮吉一生关注底层民众生存境遇的民本立场，也决定了他在清代官场的命运。

作者在书中着重描述的是洪亮吉在朝廷中的两次直言经历，而我们从中亦能看到清代政治体系的明显问题。

第一次是嘉庆三年(1798年)二月在大光明殿中举行的以翰林院和詹事府的官僚为对象的大考，题目正是嘉庆此时最为关注的如何征讨白莲教起义，由于洪亮吉的这份答卷包含对地方政治和官僚体系的激烈批评，因而在大考中只被列为三等第二名。

对洪亮吉人生命运影响更大的则是在嘉庆四年(1799年)的政治谏言经历。谏言将矛头直接对准嘉庆帝。比如，洪亮吉批评的吴省兰，其实也被嘉庆在和坤罪状中亲自批判，但吴省兰正月刚被解除浙江学政的职务，从礼部侍郎降格为翰林院编修，五月就升为詹事府右春坊的中允，七月又当上了翰林院侍读，仅仅四个月即东山再起。和坤自尽的第二天，嘉庆便宣布只要和坤的党羽能够改过自新，依然能够被任用。显然，洪亮吉以吴省兰的例子来说明嘉庆改革不彻底。总之，洪亮吉在这次谏言中的主张，可以概括为：应励精图治、用人行政要使得其所、一改风俗、赏罚分明、畅通言路、肃正吏治等。

后果可想而知，嘉庆很生气，洪亮吉被解职并拘禁在刑部，最开始按照“大不敬律”被判为“斩立决”，之后嘉庆帝告谕内阁，由死刑改为流刑，发往伊犁，路费由洪亮吉自己承担。不过，嘉庆也考虑到这种做法颇为影响自己力图塑造的明君形象，因而很快又将洪亮吉赦免。

经历死里逃生的洪亮吉，晚年回到家乡后自称“更生居士”。一方面专心著书立说，精神十分富足，与文人、官僚交游，指导后学，在这十年间创作了两千四百首诗歌，留下了《春秋左传诂》等大量重要著作。另一方面，洪亮吉终生不改对底层百姓命运的关怀，致力于帮助地方社会恢复秩序，为那些以士自居的清代读书人树立了典范。

此书引人深思的乃是作者关于以洪亮吉为代表的乾嘉士大夫悲剧命运的思考。与洪亮吉同一时代的士大夫，尤其是那批被称为考据学者的人物中，比如钱大昕和赵翼等，也会私下批判清代政治，因为士大夫们都感受到了同样状况，然而他们的文章都以婉转迂回的方式，避免直言批判。洪亮吉则勇敢地踏出了第一步，向皇帝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案。然而，嘉庆将洪亮吉的谏言视为对个人行为的批判，对洪亮吉严加处罚，导致官场气氛降至冰点。

由作者的思考，引申出一个问题：如果嘉庆帝是一位开明的君主，如果他全部接受并切实执行洪亮吉的谏言，那么，清代中国由盛而衰的命运能够避免吗？

片冈一忠当然没有明确回答，但从他将问题主要归为清代君主专制体制的做法，答案可能会是肯定的。不过在我看来，纵然嘉庆全部接受并切实执行洪亮吉的谏言，这种衰落也难以避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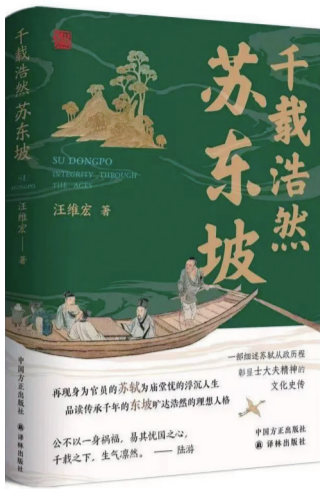
和洪亮吉处于同一时代的士大夫们，或多或少都意识到了清代制度体系的积弊，然而他们开出的药方，还是强化以个人道德伦理规范为内核的儒家治理风格。比洪亮吉稍晚的清代著名幕僚包世臣的相关思考，代表了当时一部分了解社会实际的知识分子对社会危机的反应。在包世臣看来，根本问题既不是自然资源减少，也不是人口快速增长，而是各种制度带来的积弊导致财富被自私自利的阶层所侵吞。从此角度而言，洪亮吉的思想也并未真正超越同时代的士大夫们。

面对十八世纪后期的大变局，洪亮吉的谏言和嘉庆的勤政无法力挽狂澜，这些士大夫不知道遥远的欧洲小国，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工业革命，正是这种技术革命才真正突破了人类社会千百年来“马尔萨斯陷阱”，他们更无法预料到数十年后鸦片战争的屈辱，而古老的中国也只有浴火的淬炼中才能获得重生。



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

□刘彦彩



《千载浩然苏东坡》
 汪维宏著
 中国方正出版社、译林出版社
 2024年6月

长期以来，我们对苏东坡的认知，往往局限于他的才华与个性，而对其政治生涯和从政理念却鲜有关注。这方面研究的匮乏，导致苏东坡文名太盛，而政声太弱，不能不说是一种缺憾。汪维宏敏锐地关注到了这一现状，在创作中另辟蹊径，选择苏东坡为官从政、为民务实这条主线，着重探究其忧国忧民、勤政为民的官吏形象，写就了这本聚焦苏东坡从政生涯的作品，挖掘苏东坡身为良吏、能吏、廉吏的真实历史，详述这位“大宋顶流”的政声政绩，为读者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

世人皆爱苏轼的才情纵横、达观通透，却常常忽视其仕途颠沛流离这一事实。从十几岁随父兄离开家乡眉州以后，他就像一只无脚鸟一样，一生都在各地不停地辗转，狼狽不堪。

这位少年天才，二十来岁便以一篇名为《刑赏忠厚之至论》的策论高中科举，名动京城。主考官欧阳修盛赞他“当避此人出一头地”，连宋神宗都慨叹“朕今日为子孙得两宰相矣”，对其寄予厚望。彼时的苏东坡，风华正茂，壮志凌云，“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的诗句，正是他渴望在政治舞台上大展宏图的豪情写照。然而谁也未曾料到，这份“天花板级”的开局，竟开启了他“被命运之手高高举起又重重地摔了又摔”的坎坷仕途。

《千载浩然苏东坡》以编年为经、任职为纬，细致勾勒出苏轼崎岖的仕宦轨迹，有着特殊的价值。汪维宏实事求是地刻画出了这位仕者一心为民但自身难保，又不接受命运安排的士大夫形象，而这，恰好是广大读者心目中通透、自由不羁的苏东坡的另一面。

王安石变法的浪潮，是苏东坡沉浮宦海的起点。因与新党政见不合，他不愿趋炎附势，更不愿为推行新法使得百姓生活陷入困顿，屡屡上书直言新政弊端，终被排挤出京，开始了长达十余年的辗转。杭州、密州、徐州、黄州、惠州、儋州，他的足迹遍布天下，却始终在“离京一回京一贬滴到更远的地方”的循环中挣扎。更致命的是“乌台诗案”，一场莫须有的文字狱，将他打入大牢，历经生死煎熬，险些命丧黄泉。其仕途之狼狽，从他留下的“居无室，食无肉”“食无盐酪，居无室庐”等文字中可见一斑。更别提他的诗句“路长人困蹇驴嘶”——走不完的路啊，疲惫不堪的我啊，还有那瘸腿的驴子嘶鸣不已，这大概就是苏轼人生的日常吧。

作为一个中年人，我深刻体会到苏轼的至暗时刻绝非被诗意化了的小窘迫，我认为可以用五个词来概括他的人生经历：尊严扫地、穷困潦倒、舟车劳顿、苦寒溽热、病痛折磨。总而言之，这些困境都已将他推到承受能力的悬崖边上，再往前一步，就是死。我们每个人都会遇到困境，但是恐怕没有几个人有这么大起大落的人生。豁达只是结果，苦难才是过程。

但苏东坡的伟大，正在于他从未被苦难压垮。《千载浩然苏东坡》以时

间为轴，清晰展现了他在绝境中的精神蜕变。苏东坡用自己的一生为后世提供了一个绝好的人生样本：进则不遗余力，退则诗酒年华。人在绝望时最接近神性，他以极高的悟性打通了活着的所有痛点，实践了道法自然、自然而然的最高生存法则，真正做到了“一点浩然气，千里快哉风”。

若将《千载浩然苏东坡》仅理解为一部记录个人苦难的传记，便低估了其价值。本书最动人的篇章，在于展现了苏轼如何在个人命运的多舛中，始终坚守“为民请命”的士大夫精神。

在这些人生低谷时刻，绝境之中，苏东坡是否有过虚弱无助的时候？太多了！他太多次不想活了。“乌台诗案”降临时，他已经做好了死的准备，而此后被发配儋州，他干脆让人准备好了棺材。可是即便如此，在给朋友季常的信中仍然写道：“若获尽力鞭捶之下，必将捐躯矢石之间。指天誓心，有死无易。臣无任。”上效忠于皇帝，下尽心于百姓，这一点他从来没有变过。

我们都知道，在临终前不久，苏轼对自己的一生做了总结：“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诚然，他一生的抱负都在于“做一个好官”。哪怕在人生最苦的这三个阶段，在挣扎与困顿之际，他仍在当地孜孜以求地做着为百姓去苦、为苍生谋福的实事：

苏轼刚到徐州上任不到三个月，就面临黄河泛滥，洪水冲击徐州城的危急灾情。彼时，徐州的官员富商们争相外逃。作为太守的苏东坡先是劝导大家停止外逃，后宣示“以身帅之，与城存亡”的决心。在长达一个月的时间里，他都以身作则，寸步不离抗洪一线，在临时搭建的工棚里指挥作战，建成了防洪大堤，阻挡住了洪水。佳绩传到京城，宋神宗听后大喜，于是下诏嘉奖。对此，我们求真务实的苏轼谢表道：奔走服勤，人臣之常事——为老百姓服务，就是我的本职工作啊，这不足为道。

这样的治政实绩，在苏东坡的仕途中并非个例。他在杭州主持修湖工程，一方面疏通淤塞，另一方面为西湖的生态建设作出巨大贡献，更是解决了周边百姓的灌溉问题；他在儋州打井，在当地推广农业技术，解决了百姓健康饮水问题；他在密州遭遇蝗灾，不顾个人安危深入田间地头，带领百姓捕杀蝗虫、开垦荒地，为百姓带来生路。这些事关水利、虫灾的大事，没有一件事是好干的。

在《千载浩然苏东坡》的叙述中，我们看到的不是不食人间烟火的不文人墨客，而是一位脚踏泥土、心系苍生的实干家。而且，当我们在任职过程中遭遇不利、不公的事情时，也可以从苏东坡的事迹中吸取力量。这确实是苏东坡一个人的受苦历程，但更加是一代又一代中国士大夫的精神榜样。

尽管从仕途的角度来看苏东坡，他的人生跟美好一点都不沾边，但我们从他留给后世的诗词歌赋中，却可以窥见一个有着美好精神内核的人。苏轼的家教和他对儒释道的融汇吸收都在塑造着他美好的内核。据记载，苏洵少年时期“厌学”，四处游历。程夫人本出身名门，下家到寒门苏家，丈夫还不求上进。她兄长程潜不愿妹妹委屈，要接她回娘家。没想到程氏生性要强，不愿意回去。苏洵知道后羞愧万分，从此闭门读书，最终成为一代文豪。苏洵笃行，苏轼、苏辙也好游历山水，这一家子的“爱玩”特性，很难说这不是他们的家族基因遗传。而这些成长背景，都在潜移默化中塑造着他的人格。成年后，苏东坡更是博览群书，将儒家的“仁政”思想、道家的“顺其自然”与佛家的“超脱豁达”融为一体，形成了独特的人生哲学。

是的，活着很难，死反而简单。为什么苏东坡经历过构陷冤枉、万里奔袭，不仅没死，反而活成了千年来中国人最美好的象征？我想，以上文字便是答案。